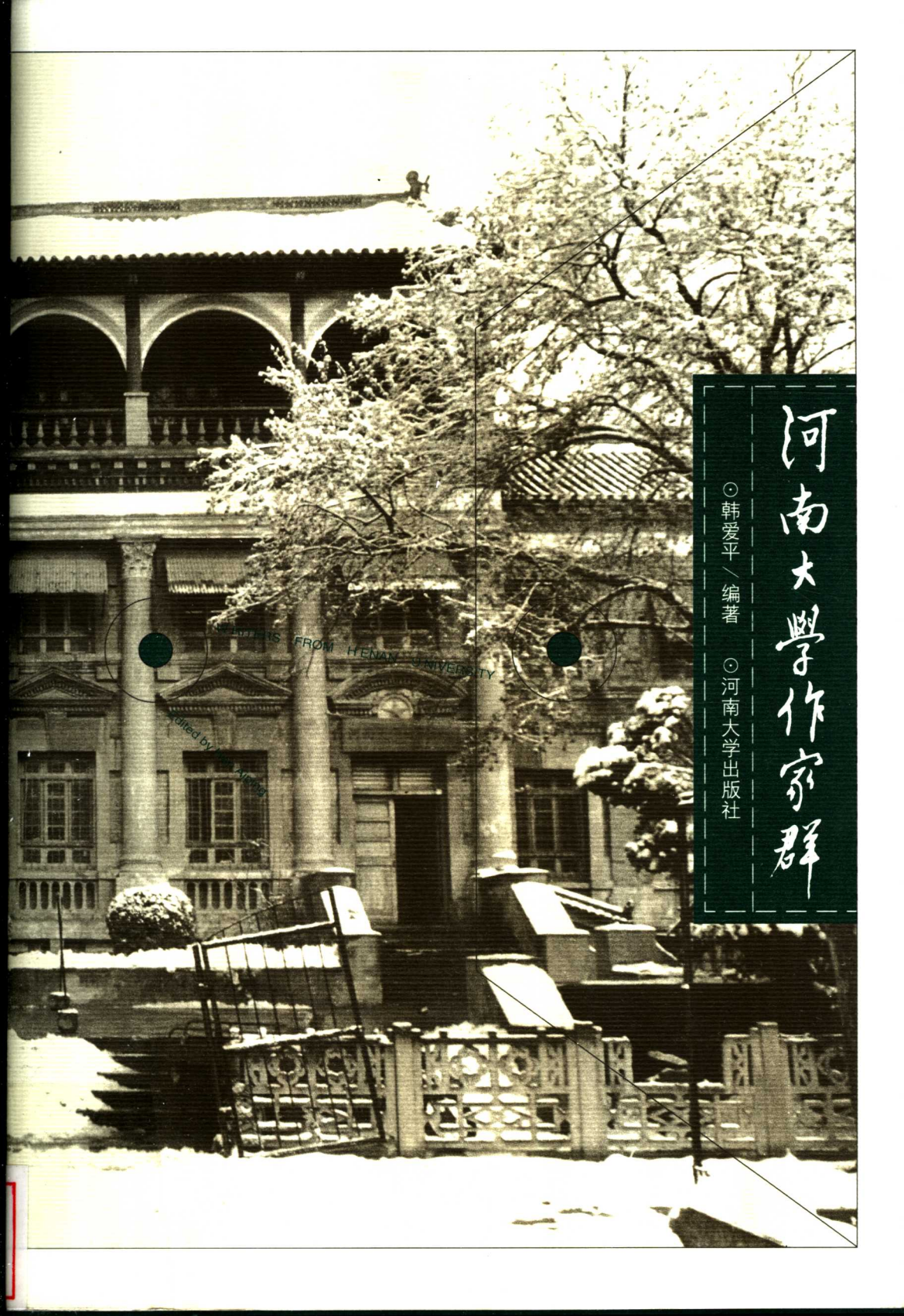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學作家群

◎ 韩爱平 / 编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964540

K825.6

H070

河南大學作家群

◎ 韩爱平 / 编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7964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南大学作家群/韩爱平编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9(2003.3.重印)

ISBN 7-81041-955-2

I. 河… II. 韩… III. 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1509 号

书 名 河南大学作家群
编 著 韩爱平

责任编辑 侯惠娟
责任校对 何 众
责任印制 苗 卉
封面设计 张 胜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事业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大学出版社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41

字 数 602 千字 印 数 1001—3000 册

ISBN 7-81041-955-2/K·315 定 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 言

作家群是指文学发展中在一定地域或一定时期内集中出现的作家密集分布现象。在河南大学的发展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密集分布的作家群体,这些作家的文化脐带,就是他们的母校河南大学在非凡的岁月中所形成的学风和文风。追根溯源,就不能不提到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思想、文化上所做的准备。首任校长林伯襄曾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和西洋文明教育。早在创办“明强学堂”时(1903年),他就提出了“明耻”、“兴邦”的教育思想。同时,他十分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学风建设,为河南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90年的风云际会,90年的深厚积淀,在欧美先进文化以及中原古典文明的熏陶下,河南大学作家群成为这所百年老校的精神硕果。同时,它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成果。而当我们沉醉于它的绚丽和芬芳之中时,我们不应该忽视风雨的凄凉和岁月的艰辛对这片丛林的摧残、蹂躏及其所化作的锻炼。

辉煌常与苦难并存。



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河南大学自己的选择。前些年,《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中国大学排行榜,河南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全国各高校中名列第17位。这显示了河南大学在师资方面的一种优势。第17位意味着什么呢?全国的重点大学有几十所之多,而由于种种原因,河南没有一所。但是,名校并不全是由“宣布”所决定的:在这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重要发祥地,如果没有这样一所能在全国位列第17位的大学,那就太令人失望了。时下流行一个文化新概念,叫文化品牌。品牌并不是商品专有,一个集体或团体也可以拥有。河南大学作为高校,首要任务就是生产优秀的人才,生产大批的对民

族、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那么，师资就具有了异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材料表明，一个特殊的人才，可能造就一所了不起的学校，而这个特殊人物的品行对一所大学有着直接的影响。若没有蔡元培，一个声名赫赫的北京大学可能会更晚一些时候产生；而河南大学，若没有冯友兰、范文澜，它肯定是一所相当平庸的学校。河南大学在建国前曾是名列全国第6位的“国立大学”，它靠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像冯友兰、范文澜这样的一群卓越的学者。他们深刻影响着学生这个特殊群体。这里有一份20世纪20年代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的《文艺》“发刊词”，为冯友兰亲手制撰：

《文艺》者，中州大学学生所组织之“文艺研究会”之刊物也；其中所载，除指导员（指导员，由本会聘请的专家、指导小组。见《文艺》第1卷第1期，1925年）之著作外，大部分皆会员之作品，都十万余言。

“文艺研究会”以研究国故及文学为宗旨。所谓文艺，盖取其名之广义，如所谓欧洲之文艺复兴者然。故此刊中所载诸作，依其性质，约可分为二类：研究国故之论及文学作品。

近来一般学者，大倡以科学方法研究国故之说；其实除文学作品之外，世上果有非科学之学问乎？科学方法实即普通思想方法之较有系统，较认真，较精细者，非有何神妙也。科学方法与普通思想方法，犹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其差别乃程度之差别，而非种类之差别。所以凡一学问，苟至精深之域，其方法皆系科学的。至于文学作品，乃想像力之产物，其目的本不在求真，故为非科学的。

故广义之学术中，有为理智之产物，有为想象之产物；《文艺》中所载，研究国故之论文，属于前者；文学作品，属于后者。为编辑此刊，诸会员得以使其理智力及想像力，皆有适当练习之机会，不可谓非幸事；至于估定诸论文及文学作品本身之价值，则有待于读者及大方之家。

由此可见冯友兰对青年学生追求“文艺事业”支持之一斑。《文艺》周刊是一份学生刊物，主编者有冯友兰、吴汝滨、许敬参三人，刊物由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承印。其第一期有冯友兰所作的这则发刊词、吴汝滨的

论文《文学的实质与形式》等,其他都是文学作品,如许敬参的小说《九弟之死》,李五桥的小说《打消》,于锡乾的诗歌《进行》、《狂风》、《雨后山》、《月夜》,王志刚的戏剧《爱的牺牲者》等。中州大学的文艺研究会,名誉会长是李敬斋和冯友兰二人,下设正副会长二人,还设有庶务、文牍、会计和编辑员,其他分设韵文组、散文组、骈文组、书法组、考证组和小说戏曲组,每组又分设干事和评议员,第一批会员有39人。我们搜索史料,可知《文艺》周刊是在河南大学历史上出现较早的文艺团体的刊物,其目的明确、阵容整齐,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是不多见的。应该说,河南大学师生的共同热心与努力,形成了珍贵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性促成了一种文化传统,那么,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自然而然了。

河南大学的文艺社团及其所办刊物,追求真理,勇敢地面对社会和人生,形成了河南大学光荣的文化传统。1928年秋,以河南大学学生为主体的“晨星社”和该社的社刊《晨星》半月刊在开封诞生,“晨星”取意于鲁迅《热风》中的名句,即“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在其创刊号中,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当时的青年学生任访秋发表了关于茅盾“三部曲”的评论文章。20年代的中州大学,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涌现出中州大学“晓钟文学社”和《晓钟》文学旬刊(1925年)、中州大学陈吉亭主编的《心波》文学旬刊(1926年)等。中州大学附中受其影响,出现了“曙光文艺社”和《曙光》文学半月刊、“春潮文艺社”和《春潮》文学旬刊。1930年7月,河南大学“群星文艺社”在《河南民国日报》上所编副刊《群星》文学周刊,颇有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河南大学文学社团及其刊物影响最大者,当数1931年创刊的河南大学“心音社”和《心音》文学半月刊。刊物由河南大学学生黄增祥(黄寿山)主编。《创刊号》上刊有两篇译作,一篇是小说《孩子们的乐园》,一篇是独幕喜剧《青年梦》。《心音》发刊词开题便称“我们十二同学是友谊的团体”,“歌唱着友谊虹彩之歌,探寻美丽绚烂的人生”,作为其“目前生命之力的欢愉,亦即终局心海融流之希望”。他们所追求的是“脚踏着知识的园地,写出实在的生活与感想,犹如新春一到,树木萌碧,莺鸟娇啾”。这是由当时河南大学三科(文、理、法)七系(西洋文学系、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社会学系、教育学系、生物学系和经济学系)学生有感于

“醉生梦死，尸气奄奄的河南学术空气”而创办的刊物，他们大声喊出“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之火，能燃烧同志们的心灵，同唱合奏一支学术进行曲，其清澈的音节，虽不必绕梁三日，震撼百世，却可给肉感电影化之青年们一支血清针”，“愿一点一滴点点滴滴探求创造的生涯”。文学学院院长李步青（廉方）和教授缪彦威（钺）分别为《心音》题词，同时，从其“编后记”中可知，“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段凌辰先生与本校教授杜衡、吴重狱两先生赐以鸿文巨著”，这对《心音》的创办者来说是莫大的支持。1933年5月，河南大学“村笛社”创办了《村笛》文学半月刊，以译作为主，如其第1、2两期所载象乾的戏剧译作《舅父凡尼亚》，张建的诗歌译作《甜蜜居留在家了》，可如的小说译作《一个旧式学校》，刘复舞译的《现代西洋女性作家介绍》等。1933年10月，河南大学“新生活社”创办了《新生活》周刊，载有李至的杂文《到西北去》、《陕西怪现象》，郝崖的小说《法网》和润溪的小说《月夜》。1934年5月，河南大学“三三社”创办了《三三》文学双周刊。从其1~4期上看，翻译文学作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于赓虞的诗歌译作《我是宝剑》、《秋景》等；心愚的小说《是谁害了你》，也在此连载；郭绍虞的诗歌评论《邵雍的诗歌》，其他还有天功的散文《力》、石榆的散文《失望》等，都洋溢着厚重而清新的气息，从一个方面显示出河大学人的文化传承特点。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是联系师生情感的文化纽带，共同营造出一定的文化时尚，有这样丰富的社团和刊物，河南大学作家群沿传至今，也就毫不奇怪了。

河南大学的社团和刊物对河南大学作家群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最典型地体现在抗日战争的非凡岁月中。七七事变后不久，范文澜、嵇文甫他们就创办了《风雨》周刊，组织了“河南大学抗日游击战争讲习班”、“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当开封沦陷后，河南大学移至豫西嵩县潭头，河大师生在那里成立“河大中原青年文艺笔会中心”，创办《青年文艺》半月刊。此时，在外是日寇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内有国民党特务明察暗访、跟踪盯梢，但英勇的河大师生不屈不挠，坚定地进行新文化建设和宣传。所有这一切，应该说，都是河南大学作家群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因为作家，尤其是优秀的作家，首先是英勇的战士！河南大学师生敢于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学风，直接促成了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形成与日益发展壮大。

品正为范。河南大学的教师、学生热心于文化刊物的创办,许多人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不放弃对文学事业的向往追求,这在事实上构成了河南大学的文化传统的内核。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河南大学作家群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河南大学工作或工作过的教师,一部分是在河南大学读过书的青年学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共同铸造了河南大学作家群这座丰碑。

这里首先应提到于赓虞、任访秋、苏金伞和周启祥等人,他们积极创办、主编刊物,热心扶持学生办的刊物,并主持文化阵地,发表文学作品,有力地支持和影响了河南大学作家群早期规模的形成。河南大学教授杜衡所开设的《近代文艺》在《风雨》周刊连载,在当时颇有影响。《风雨》周刊不仅锻炼了河大师生,并且培养了一批有作为的作家,成为早期河大作家群的中坚。

于赓虞不但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他曾在《河南民国日报》连载翻译世界古典诗歌名著,将但丁的《神曲》全译。他的《世界文学史》更是独树一帜。他的诗作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被称为“骷髅诗人”。20世纪的20年代(1925年),于赓虞曾在《豫报副刊》发表《不知名》等诗歌,继而连载其“通信”《〈北风〉之先声》;接着他与汪漫铎、叶鼎洛一起主编《银砂》文学半月刊;1940年秋,他主编《小学生》(后改为《新少年》)文学月刊。仅在1925~1935年间,他就出版了诗集《晨曦之前》、《落花梦》、《骷髅上的蔷薇》、《魔鬼的舞蹈》、《孤灵》、《世纪的脸》等多部;同时,他还发表《新文学的历史来源》(《大陆文艺》1933年12月第1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河南民报》副刊《茉莉》文学周刊1934年1月21日至3月4日连载),以及诗歌评论《抒情诗中独自的静境》、《1932年日本诗坛的回顾与展望》等(《河南民报》1933年1月12日、2月28日)。他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诗坛上非常活跃的诗人,言传身教于河大学子,自然是河大作家群的一滴催化剂,一滴虽小而极其重要的催化剂。

任访秋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早在二三十年代,他与人一起主编《晨星》,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论文,曾师从于钱玄同、周作人等著名学者。40年代应聘到河南大学后,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河南大学。当时,他在《前锋报》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主编《师友》半月刊。《师友》1946年5月创刊,发表有任访秋的《作品的传轶》、《苏轼的小品文》和《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等文章。苏金伞在《师友》上发表诗歌甚多,如《太阳》、《玉蜀黍》等。还值得一提的是,郭争廉所作《〈儒林外史〉研究》在《师友》上连载,不知这是否是后来任访秋先生在河南大学首开中国近代文学的缘由?1945年12月,《中国时报》副刊《桥》周两刊在开封创刊,任访秋在《桥》上发表《鲁迅先生》等文章,不知这是否属后来先生研究鲁迅的重要开端?

苏金伞曾在河大教书,在潭头的岁月中,创作力尤其旺盛。1926年,他在《洪水》月刊上发表处女作《拟拟曲》,自此走上文学道路。三四十年代在河南《茉莉》周刊、《青春诗刊》和《山雨》月刊等处发表许多优秀诗作。1946年5月,苏金伞创办并主编在《中国时报》上的《诗与散文》不定期刊,即:《柳哨》、《帆》、《牛》、《忧郁的黎明》、《石榴花》、《火炬》、《小夜曲》、《农村夜曲》等诗辑。他在自己主编的阵地上发表了《遗弃》、《摘棉花》、《两只残废的蟋蟀》等诗作,同时还大力扶植文学新人,如栾星的诗歌《知识分子的画像》,即在苏金伞主编的《牛》上发表。在这一时期,苏金伞与赵梅深(即李蕤,河大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一起主编《春潮》文艺月刊,姚雪垠、李蕤、栾星等河大作家曾在这里发表文学作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1947年,苏金伞又与李蕤一起在开封创办《沙漠文艺》月刊,并在《黄河文艺》文学月刊、《学风》文学月刊等处发表诗作。应该说,苏金伞先生是河南大学早期作家群的重要前锋。

周启祥还是一个少年时,就以小诗《心愿》在同学中闻名,后来在《流沙》诗周刊、《沙漠诗风》、《跋涉》、《黄流》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他曾与田河一起主编《诗场》,与周肇瑚等人主编《行都日报》的文学副刊《大地》日刊,主编《河洛日报》的《文艺反攻》文学周刊。他曾以“丁明”的笔名发表过诗歌评论《评胡适的〈尝试集〉》、长篇诗歌《农村夜曲》等。后来在河大任教的万曼、李嘉言、张长弓、刘溶池、宋景昌等河大教师,此时期也频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这都具体影响到河大作家群的发展和壮大。尤其是张长弓,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并举,30年代在陈雨门主编的《茉莉》文学周刊上发表系列“中国文学史论”,在刘蔓茜主编的《茉莉》文学月刊上发表译作《汉诗中的人生观与死后观》等。更不用说,在40年代他搜集民间曲艺集成的《鼓子曲》系

列,迄今仍是国内外民间曲艺研究的重要资料。一般学者不会注意到,像嵇文甫这样的学者,在40年代也坚持文学创作,如1946年3月创刊的开封《中国时报》副刊,嵇文甫曾发表《真诚》、《王道外交》等“新说书”这种文艺作品。其他像杜衡的讲演《近代文艺》,在贺肇弗主编的《河南民报》副刊上,自1933年4月第81期至1933年5月第124期连载。这都是河大学者对河大作家群的形成与发展所做的具体贡献。由此可见河大教师队伍对文学创作特有的热情。

二

河大作家群代代延续,自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至今,若长河奔流不息。个中原因除了河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求是、求实的学风。河大学人积极拥抱现实,而且十分注重文化修养,形成河大作家群重要的文化特色。这不仅在一些教师中可以看到,他们创作与学术皆优,而且也鲜明地表现在河大学子的身上。如早期曾在河大求学的作家,如蔡一木、姚雪垠、吴强、周而复、赵清阁、刘如水、赵悔深(李蕤)、栾星等。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尤为活跃,很多人都是多面手,既能写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又能写评论、翻译,还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风尚代代相传,直到今天。其中最突出者是姚雪垠。姚雪垠1929年入河南大学读书,早期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进行了多种尝试,主编过《大陆文艺》和《海天》等文学月刊,还主编过《河南民报》的副刊《艺术》、《平野》和《寒笈》等文学周刊,参与过《风雨》周刊的编辑工作。二三十年代他的学术活动如关于《元剧录》戏曲史料的探索,连载于《河南民报》副刊自第14期至19期;他还发表过《论元杂剧的扮演》(《河南民报》副刊《茉莉》周刊1933年3月23日)、《从吃菜说到张友仁君的画》、《到处老鸦一般黑》(《河南民报》副刊《平野》2卷1期、3卷1期)等评论文章;至今我们还有许多学者不知道,姚雪垠还曾经深入进行过中国古典神话研究,如1934年《河南民报》副刊《平野》文学周刊上,曾连载他的《羿射十日——中国神话研究系列》(自5卷6期至6卷2期)。我们知道姚雪垠发表在《茉莉》文学月刊上的《血衣》等早期小说,知道他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长夜》,更不

用说划时代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但我们还应该知道他早年所从事的这些文学研究活动对他的创作所发生的重要影响。

蔡一木是一位为我们所忽视的作家。20世纪30年代他曾主编《河南民报》副刊《诗刊》，创办了《黄流》文学月刊。在他主编的报刊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同时，他也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理论文章，如《黄流》文学月刊的《发刊词》和各期《编后记》，都集中体现出他的文学观念。其他如《什么是小品文》（《黄流》1935年9月1卷3、4期合刊）、《欧洲小说演进略谈》（《黄流》1935年10月1卷5期）、《由文学发展的历史谈到民族文艺》（《黄流》1935年11月1卷6期）、《送1935年》（《黄流》1936年1月1日2卷2期）、《作家与批评家应有的态度》（《河南民报》副刊《平野》文学周刊1934年10月8卷5期）等，从不同方面表现出他深厚的文学修养。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1935年黄流文艺社出版的《文艺论文集》。

1932年借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的赵清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数的女作家。她曾为报纸主编过《妇女》、《文艺》周刊，一些作品就发表在自己主编的阵地上，并且还为《河南民报》、上海《女子月刊》等报刊写稿，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各种体裁，全面出击。早期作品集有《早》、《华北的秋》、《凤》、《女杰》、《血债》、《反攻胜利》、《生死恋》等。1946年前后，她的创作达到最高峰，话剧、散文、长篇小说等作品如激流在喷洒一片深情。毋庸置疑，这些激流来自厚积，一方面是她自觉投入火热的生活，一方面是她自觉加强自身理论素养的提高，从而使她的创作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早在1937年，她就出版了《妇女职业与解放论》的论文集，仅1939年，她就又出版了两部戏剧理论著作：《抗战文艺概论》、《抗战戏剧概论》，1942年又出版《编剧方法论》。抗战初期，她主编的《弹花》文学月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在武汉、重庆产生过广泛影响。她创作的二十多部话剧，宣传抗战，抨击卖国投降，一经演出，便反响强烈，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李蕤（赵悔深）也是这样。三四十年代他曾经主编过《渤海》文学月刊、《河南民国日报》副刊《晨曦》文学周刊和《河南民报》副刊《河畔》文学周刊、《山雨》文学月刊、洛阳《阵中日报》副刊《军人魂》日刊、南阳《前锋报》副刊《笔锋》日刊和《隧火》三日刊、开封《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

版》副刊《春蚕》文学周刊,与苏金伞一起主编《沙漠文艺》文学月刊等。他早年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其中,诗剧《易水上》在当时引起积极反响。赵梅深勤奋创作,勤奋思索,勤奋学习,1932年11月,他在《河南民国日报》副刊《晨曦》文学周刊上,发表《新旧文学之平见》;1935年4月,他在《河南民报》副刊上连载《看〈女人〉后记》;1935年7月在《河南民国日报》副刊《中原》日刊上连载《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不久,又连续发表《评〈子夜〉月刊》、《死的气息》、《汉字不妨尽量通俗化》、《扔掉包裹》、《论轮回》等评论、文学理论文章。其他还有贺肇弗、刘如水,他们都主编过文学刊物,发表有大量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同时,也发表一些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的文章。如刘如水,1932年4月创刊的《河南民报》副刊《奔云》文学五日刊,发表了《正名论》;同年7月创刊的《风雨》双周刊上,他接连发表了《尚钺作品一瞥》、《〈风雨〉之声》、《读胡愈之著〈莫斯科印象记〉》、《〈风雨〉的过去及将来》、《雨丝风片》、《爱与憎》、《文学在中国之轨迹》、《文学与社会》、《鲁迅的〈伪自由书〉》、《创作的态度》、《似水流年》、《小人物与大人物》、《文与其人》等理论文章。同时,刘如水还发表一些翻译作品。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河大作家群从一开始就注重自身理论素养的提高,而理论支持,使河大作家群保持着厚重的文化气息,从而避免了昙花一现的浮躁、浅薄等习气。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国立、私立大学并不少,而像河南大学形成长盛不衰的作家群者,于当时应该是独树一帜的。究其原因,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家队伍建设中理论素养的不断提高。这也是河大作家群一个醒目的文化特点。这种特点在半个世纪后的八九十年代,在河大又一代作家群中表现更为明显。没有理论和思想的支持,文学就会失去深邃。

河南大学作家群不惟注重自身的文化理论素养的不断提高,而且十分注重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以范文澜为例,他在河南大学教书时,为文学院开设了“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钞”等课程,自编上古史、文学史讲义,而且积极投身现实斗争,与王澜西他们一起编辑《风雨》周刊,主编《大时代》和《经世》半月刊,并与嵇文甫等河大学人一起成立“抗敌工作训练班”,后来“投笔从戎”,被人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他是河南大学的一面文化旗帜,深刻影响着河南大学的文风、

学风的建设。他所参与编辑的《风雨》周刊,在某种意义上可看做河南大学作家群的演兵场。如1937年《风雨》周刊创刊号所载“编者的话”:

伟大。解放战争已经发动,兴奋的日子开始了。

谁都知道,全国上下一致奋起走上救亡前线,是我们胜利的保证之一。在前线,我们需要飞机和大炮;在后方,我们同样地需要文化武器。疯狂的日本军人毅然地来屠杀我们,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时候,我们就毅然地起来抗战,为我们,为东亚,为全世界,担当起维护和平,保障文化,反帝反侵略的重任,为着上述天赋的使命,我们的《风雨》就匆匆地诞生了。……

在第3期的“编者的话”中,编者诚挚地写道:“为发挥更大的救国力量,自第2期起便力求向通俗方面改进。这一期范文澜、徐述之两先生的论文都写得深入浅出,又非常生动有趣。从下期起,文艺方面我们打算多增加一点字数,并尽可能地登载一些文化界的救亡情报和前方的速写或通信。”这种风尚体现了河南大学作家群身上鲜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如马可,1935年9月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发起和组织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创作《抗日五更调》等作品。不久,他便走出校园,参加“抗敌演剧队”,到广大农村、工矿宣传抗日救亡,并创作了《保卫南阳》、《守黄河》、《游击队战歌》等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冼星海称之为“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后来,他参加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为河南大学作家群增添了极大的光彩。吴强也是这样,他1936年入河南大学教育系读书。抗战爆发后,他毅然离开母校,组织战地话剧团,宣传抗日。他曾经和王澜西、范文澜、姚雪垠他们一起创办《风雨》周刊,曾发表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老黑马》等作品。离开河大后,他投入到更广阔的天地中,为新中国捧出了一部《红日》,同样,也是为河大作家群抹上了绚丽的一道霞彩。邓拓,1934年入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深受王毅斋先生的厚爱,在校读书时就完成了《中国救荒史》。他遍查文献典籍,深入社会调查,如他在书中所述,“灾荒史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必须揭示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同时,他还组织领导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他后来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风,

与他在河大读书、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告诉我们,没有深厚的文化理论素养,不可能创作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而如果不走出书斋,走向广阔的社会大天地,同样不会有伟大的创作。单纯的描绘风月,也许能博得一时的喝彩,但决不会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只有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勤奋思索,直面人生与现实,才能真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大手笔。尤其是河南大学作家群英勇无畏的文化精神,诸如范文澜、姚雪垠,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曾受到当局的迫害,或辞退,或开除,但他们从未因此而停止斗争、进取的步伐,而是把河南大学时代的生活化作顽强的意志。无疑,河南大学的生活,成为他们多年后深刻的记忆,为他们的作品增加了难得的厚重。他们绝不会因此怨恨河南大学,而是很感激母校。如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回母校所作的《向母校汇报》中所讲,他非常感激母校,是母校的培养,他才成为作家、走上文学之路的。他是这样,几乎所有走出河大校门的作家都有这种感受。

三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品格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文学和教育从古典转向现代。而这种转变的进程,则是那样漫长和艰难。河南大学作家群在这一进程的融化中,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河南大学作家群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各个阶段,都体现出河南大学这所中原名校与国家、民族命运的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在格局上多注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著名作家的个案形成,二是各种文化运动对文化、文学发展的具体影响,而不同程度上缺乏对作家群现象的关注。河南大学作家群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部分,它的历程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裂变、整合、选生的文化典型。

河南大学作家群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代,也可以分为五代。所谓三代,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划分的,即建国前在河南大学读书、工作和生活过的作家,诸如 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王实味、徐玉诺、郭绍虞、樊粹庭、于赓虞、王实味、杜衡、朱湘、罗根泽、范文澜、姚雪垠、蔡一木、刘如

水、赵悔深、赵清阁、贺肇弗、邓拓、马可、苏金伞、吴强、周而复、任访秋、张长弓、万曼、栾星、周启祥等人。他们主要是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代，当然，也有新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教育。这些作家是第一代。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即5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大学生活过的作家，他们显现出与第一代明显不同的文化风度。这一部分作家以孙广举和孔令更等人为代表，事实上又可以分为两部分或两代，即“文革”前以孙广举为代表的作家，相对较为完整地受到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以孔令更为代表的“文革”后期入学的作家，俗称为“工农兵学员”，其知识结构则表现出参差不齐的特征。这是时代造成的，我们没有必要强求他们。这两部分作家因为时代文化氛围而形成类似的创作风格，所以，我们还是把他们划为一代。“文革”结束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的“老三届”和“文革”中读书的青年学生一起，经过严格的高考，齐聚在河南大学，接受带有复兴意义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一代作家的阵容更加宏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河南大学作家群自身的文化接应。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二代作家与第三代作家，甚至包括第一代作家，他们同处于一个文化时空之中，形成蔚为壮观的河南大学作家群三世同堂的局面。如第一代作家中的姚雪垠，以《李自成》第二卷之后震撼文坛，获得茅盾文学奖；苏金伞的诗歌如重新喷发的火山，激起一片片、一阵阵掌声和涛声。第二代作家群中的孙广举以散文《鸟情》、《星云月三赋》在文坛异军突起，同时，他和刘增杰、耿恭让、王振铎、刘思谦、张俊山、余非、鲁枢元等人一起构成强大的理论和批评阵容，使人刮目相看；屈春山的散文，李洪程、王怀让、孔令更的诗歌，张凤礼的儿童小说，张惠芳、王刚的报告文学，李晓燕的小说等，也都在这个文化时空中非常引人注目，很多作品在全国都引起过轰动。第三代河南大学作家群事实上也可分为两部分或两代，一部分是50年代出生者，以“老三届”为主，如刘学林、曲令敏、陈俊峰等，一部分是60年代出生者，如沈卫威、焦国标、高有鹏等。但是，特殊的文化背景将他们这两部分作家拉进同一个教室，尽管他们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迥异。第三代作家群较早引起文坛关注者，是“老三届”出身的一群人，在八九十年代，两军相汇，组成一个以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为特色的更为庞大的文学方阵。在这个方阵中，小说创作上，刘学林的短篇小说《品茶》等作品以“老到”

而著称；高有鹏的长篇历史小说《袁世凯》（一、二、三）等，以恢宏的气势别开生面；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等表现出清新的意境和深邃的哲理；孟宪明的长篇儿童小说《双筒望远镜》使儿童文学审美品格发生了重要变化；武和平的长篇侦探小说《血案疑踪》等作品，还有周常林、秦俊等人的小说，在文坛上都有一定反响。诗歌创作上，程光炜在大学读书时就引起诗坛关注，而后他走上诗评和诗学研究的道路；陈俊峰、易殿选、王剑冰、高旭旺、杨吉哲、刘根社他们在 80 年代的诗坛各呈姿色；当年的“羽帆”诗社，至今还颇为活跃。散文创作上，王剑冰主编着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选刊》，他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有着突出成就，而且在散文理论研究上有着突出贡献，贾平凹说“应该向他致敬”；曲令敏是一位有影响的女散文家，清新、隽永的文风为当代散文注入了生机。在杂文创作上，宋立民和焦国标曾被《杂文选刊》评为全国最佳杂文作家的第四名、第八名。这一代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建树体现出簇新的美学风度，如金惠敏，当年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批评论纲》被称为“第五代批评家”的代表，后来他转向了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文化理论研究。特别是他关于叔本华的研究，已超过了一些颇有声望的老一代学者；关爱和对于桐城派的研究，沈卫威关于学衡派以及胡适和茅盾的研究，解志熙关于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究，孙先科与李少冰关于新生代作家的追踪研究，其他还有梁工关于《圣经》文学的研究，程健群与高有鹏、吴效群、陈连山等人的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都颇有特色。更为可喜的是，如今的河南大学仍然活跃着一些文学社团，例如“羽帆诗社”、“铁塔文学社”等。70 年代和 70 年代后出生的文学青年们，表现出另一番景象。可以展望的是，再过 10 年、20 年，这群文学新人会成为河南大学第四代作家群的中坚力量，他们将为河南大学赢得更大的光荣。

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发展，是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同步的。河南大学作为中原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最高学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输送了可喜的文学生力军。诸如樊粹庭、王实味、苏金伞、姚雪垠、吴强、马可、周而复、赵清阁、邓拓、栾星、李洪程、王怀让、孙广举、鲁枢元、张惠芳、孔令更、王钢、程光炜、阎连科、高有鹏等，如繁星闪烁，为河南大学赢得了可喜的声誉。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是所有的走出河大的作家，都因为母

校学术氛围的浓郁,在创作的同时表现出独到的理论思索。这是河南大学的文化传统,也是河南大学的文化特色。河南大学因此为中国文学不但提供了创作、批评人才,而且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从一个方面表明,高校是促使文学迅速而深入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河南大学作家群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和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四

回首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文学成就上出现一个马鞍形,即三四十年代一个创作高潮,八九十年代一个创作高潮。这两个高潮的形成,是与河南大学在 20 世纪的政治风浪、文化风浪中的命运有着直接联系的。

三四十年代的河南大学,经过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中州大学、开封中山大学、河南大学这几个阶段的准备,教育、教学体制几近成熟,特别是师资队伍建设上,在客观上刺激了河南大学的文风学风的浓郁。在当时的河南大学,师资队伍有三种人才构成,一部分是留学国外,接受系统的西方文明的学者,诸如冯友兰(在 30 年代的《河南大学周刊》上,我们常见到某某博士留洋归来的简讯);一部分是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学者,诸如范文澜、嵇文甫、缪钺等,在当时已经颇有造诣;另外一部分是如今相当少见的现象,就是像徐玉诺、苏金伞这样虽然学历颇低,而在新文学建设中成就斐然的著名作家,他们在河南大学的任教有着相当特殊的意义,即不拘一格、惟才是举的博大胸怀,给河南大学带来了盎然生机。打破常规,人尽其用,是河南大学走出平庸的关键;最典型者,当数缪钺——他因为学问卓越,仅 26 岁就被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破格聘为中文系教授,这是 1930 年的秋天。只要是优秀的人才,即使受到压抑,甚至迫害,也会带出生龙活虎的气象。有这样的局面,河南大学当然会涌现出姚雪垠、蔡一木、刘如水、赵梅深、赵清阁、贺肇弗、马可等这样一批在 30 年代的文坛上异常活跃的作家学子。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河南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文学学生力军,诸如吴强、周而复、邓拓他们,在五六十年的文坛上各领风骚。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河南大学校园内,五六十年代却有许